

## 漢民族心靈陰暗幽微的另一面 --吳鳳神話的省思

劉 蔚 之

吳鳳神話所反映的，乃是漢民族缺少文化自省的意識，而這乃是一種群體的病徵。本文基本的假設乃是吳鳳迷思為具體而微的一面鏡子，對吳鳳迷思的檢視能幫助我們看清楚映照中的自己，以發掘漢民族如何自我建構，及找出此一迷思背後潛在心理的可能解釋。本文試圖以「我族--他族」(us-them)的概念來貫穿所引三位分屬歷史、心理分析與社會學、政治學領域的學者之研究經驗：us-them的現象同時在於個人內心，及一民族心靈的內在；自我主觀意識到的光明正向之一面稱之us；深藏於潛意識中，主體意欲逃避、壓抑的幽微陰暗的一面則稱為them。在吳鳳的事例中，漢民族投射自身內在的陰暗幽微面在替罪羔羊---堅持蠻俗的原住民身上；神話的最後，吳鳳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原住民臣服於他的感召下，黑暗的一面解除了，一切歸屬於我族，形成Us-us的關係。在這個迷思中，歷史被誇大，並混合了幻構，一起出現在國小教材中。這種操弄的結果，使我們忽略自我文化心靈中的另一面；使聖賢標舉的文化理想淪為封閉、缺乏詮釋與自省空間的虛妄假象；使我們轉移注意去聲討那替罪的羔羊，不必面對潛藏於內心深處那荒誕詭異的陌生客。而這乃是一種潛在的群體精神病徵的先兆。

---

對民族心靈深處加以檢視，來找出我們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下的問題，是我們台灣脈絡下的研究者探究多元文化教育的諸多現象時，一種必要的功課。這將啓發我們認識經常被自己忽略的心靈中的另一面，唯有更深入地認識自我民族的深層心靈之後，方有助於我們學習面對自我民族、文化心靈的問題，以及妥適處理我族--他族的關係。

**關鍵字：**吳鳳、多元文化教育、我族--他族、精神病與權力

## 壹、前言

自古以來，中華文化---狹義地說乃是漢文化---所提供給我們的文化意象乃是具有高度倫理道德之理想的。而「中國」一詞「……自古即富含文化的意義，而成為與四方夷狄之邦分判的準據；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夏於夷者也。……所以中國象徵至公的天德和宏大天恩以化育外夷，懷柔遠人構成對外關係推展的基調，武力威勢只是維繫此一意象的實力後盾」（黃春木，1995：13）。

然在標舉這些文化理想的同時，卻很少看到傳統主流的文化自身對中華民族之深層心靈所作出的文化自省。當吾人以一種近似自戀的姿態審視民族的自我意象時，幽微晦暗、保守殘酷的一面只能躲藏在陰暗的角落。我們因此而非常容易忽略、和逃遁我們心靈之中的「另一面」---黑暗幽微的那一面。更有甚者，我們很能夠輕易地從外族之中找到一個替罪羔羊，所有自身文化之中野蠻、殘酷的特質，皆可以輕易地投射到這個異族的他人身上，當這個充滿頑惡特質的他人神話迷思中被擊倒時，吾人亦可在真實生活世界中宣稱不再有異於我族的他人存在；大家都是我們，或我們的一部分。或許這樣做能夠讓我們覺得自在些，因為一切都以「我們」的秩序，統整於「大一統」的文化之下。不過，正如本文所欲揭示的是，如果我們對自身文化有更多的深切反省，將會發現，其實我們仍不會以健康開放的態度面對真正的自己，和處理我族與他族的關係。

在真實的臺灣生活世界中，過去五十多年來由於獨特的歷史脈絡和特殊

的社會情狀---例如外有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入侵、大陸主權的淪喪、對抗共產主義等陰影，內有去除前殖民政權的社會文化影響，及掃除內部隱隱欲動的分離主義的疑雲；政府對各個族群與文化的群體所施與的教育乃是高度主流文化中心的，潛藏在教育政策後的意識型態亦是高度同化論，未能顧及各個族群。雖然整體的教育政策和教材內容對這種情形皆有需加痛省處，但這非一篇短文所能深究，本文僅以「吳鳳」這個主題嘗試予以分析(註1)，因為無可否認，「吳鳳單元」對社會的影響乃是具體而深遠的。吳鳳神話(或迷思)中，漢民族找到一頭羔羊---台灣原住民。透過這個單元，在所謂「教育」的歷程中，我們投射於這頭羔羊身上訊息是：漢族乃是高度文明發展、文化道德優越的民族。漢族是值得尊敬的好人，是人格高貴的父母官，必要之時甚且可以捨生取義。相反地，許多我們不欲自己擁有的特質，皆可在原住民身上找到：原住民像個孩子，需要被漢族管理、照護、教導和啓蒙。原住民族迷信、野蠻、嗜殺。漢族和原住民族之意象竟是如此迥異。

吳鳳神話所反映的，乃是漢民族缺少文化自省的意識，而這乃是一種群體的病徵。本文基本的假設乃是吳鳳迷思為具體而微的一面鏡子，對吳鳳迷思的檢視能幫助我們看清楚映照中的自己，以發掘漢民族如何自我建構，及找出此一迷思之背後潛在心理的可能解釋。

本研究主要引用的文獻來自學者P. Cartledge(1993), J. Glass(1995), 以及J. Benjamin(1988), 之所以選擇引用他們的觀點，在於：一、希臘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劍橋歷史學者Cartledge(1993)，在探討古希臘人如何自我界定其民族意象時，發現即使是公認很客觀的史家，如西羅多得(Herodotus)、修昔提底斯(Thucydides)，和齊諾芬(Xenophon)，作品中亦多植根於迷思或主觀的論述與創造。他們貶低異族，強加不好的特質於異族身上，進而以二元對立的手法建構出希臘人的優越特質。Cartledge這樣的對一個民族如何自我建構的歷史討論和發現，值得我們回過頭來反省在台灣漢民族，是否也自覺或不自覺地以這種二元對立、貶抑他族的方式，建立漢民族的自我意象。二、至於J. Benjamin(1988)則從社會學理論及心理分析理論的觀點，探討宰制與順從的關係。她視宰制為一複雜的心理歷程、潛藏在社會機制、家庭生活、兩性關係中的；雖然我們不斷自覺地追求自由及平等，這種關係仍使兩個體或兩群體糾結而為一。而如何解消這種真實存在的情狀呢？她提出相互肯認(mutual recognition)(註2)此一概念，以使自我之確立與求得他人認可之間，取得動態的平衡。三、最後，政治學者J. Glass(1995)的著作中，探討心智錯亂的精神病人內心世界中對自我的獨裁與逃避，以解釋在一群體社會及政治生

活中宰制現象的心理起源。依據Glass (1995)的研究，精神病患者所喪失的能力，乃是使社會的互惠平等之關係成爲可能的重要因素---例如參與社會共識的實存、對他人權利的尊重，和包容歧異性的存在。依Glass之見，這種精神的錯亂所反映在較大社會的政治領域中---特別是獨裁暴政上，乃是：追求全能、拒絕對話、創造替罪羔羊，及激發暴力。Glass倡議，正如同維繫公民個人的健康在於排除唯我獨尊，建立與他人適當的連結；國家民族之健康在於持續努力於衛護彼此權利之平等互惠。

透過所引用的這幾位學者對其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歷史反省，或對民族心靈深處的檢視之寶貴經驗，來找出我們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下的問題，是我們台灣脈絡下的研究者探究多元文化教育的諸多現象時，一種必要的功課。因爲本研究認爲，這將啓發我們認識經常爲自己所忽略的心靈中的另一面，也因爲更深入地認識自我民族的深層心靈之後，將有助我們學習如何面對自我民族、文化心靈的問題，以及妥適處理我族--他族的關係。

本文的目的在於對吳鳳迷思所反映的漢民族文化心靈，提出可能的思考方向供爲參考，而非在於提供確切的答案---事實上這也不是一篇短文力所能及。本文試圖以「我族--他族」(us-them)的概念來貫穿所引三位分屬歷史、心理分析與社會學、政治學領域的學者之研究經驗：us-them的現象同時在於個人內心，及一民族心靈的內在：自我主觀意識到的光明正向之一面稱之us；深藏於潛意識中，主體意欲逃避、壓抑的幽微陰暗的一面則稱爲them。這樣的觀點運用在台灣脈絡下的吳鳳迷思此一事例上，來探討漢民族心靈的幽微潛藏面是否妥適，或這樣的援用對解決我們的問題---找出漢民族心靈中陰暗幽微的那一面，進而勇敢地面對它、並以適當態度面對與其他民族文化之關係，這個嘗試是否有效，則保持開放態度，敬請諸位先進不吝指正。

## 貳、Us-Them 與 Us-us

古希臘人曾以負面的方式建構自我的認同，其手段乃是將所有不屬於他們的特質先標舉出(這當然是那些蠻族身上才會有的)，繼之以極端對立的手法，勾勒出所謂的希臘人(Cartledge, 1993: 12-3)。這在古希臘史學家中，乃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區分我族-他族的手法。例如，亞里斯多德即曾以極端化對立的手法，標舉出野蠻人之奴性，進而斷言(而非論證)希臘人對比而出的

自由，而且，正由於希臘人生而自由，而蠻人生而具有奴性，希臘人之統制蠻人乃是正確而適當的，對蠻人自身乃是有好處的 (Cartledge, 1993: 40)。這種將蠻族他人化 (othering the barbarian)，以對立出自由公民的希臘人之手法，史學家修昔提底斯 (Thucydides) 也同樣使用過：在一場與成年男性之希臘公民士兵的戰鬥中，他以為蠻族連匹夫之勇都沒有，更別說是希臘人的雄性氣概了 (Cartledge, 1993: 53)。而另一位史學大家西羅多德 (Herodotus) 的歷史作品中，亦以一連串重疊的意象---非農耕生活的、非都市的、未開化的，以及遊牧的、波斯式東方的獨裁暴政等意象來界定蠻人。這些被呈顯的「野蠻他人」(barbarian other)，乃是反希臘化的典型，正可如鏡子般襯顯出所謂的希臘人---具有所謂希臘式共和的自由、自我管理 (self-government) 等諸多優越特質。

這種 Us-Them 的對立手法乃是古希臘人自我界定的方式，傳統中華文化乍看之下似乎並未使用如此極端對立或二元分化的方式。古代中國士大夫們的觀念中認為中華文化乃是涵容廣袤的，只要其他民族受到啓蒙光照，很快就會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優越性，和己身文化的不如人。(「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夏於夷者也」)；爲了他們自己的好處，他們會非常情願地同化於優越偉大的中華文化之下(這化育外夷乃是「至公的天德和宏大天恩」)。雖然乍看之下這與古希臘人所採趨徑或有不同，事實上從吳鳳的例子來看，中華民族所採方式更爲精巧微妙。我們不需要採用極端對立或猛烈攻擊其他文化的方式來對待其他文化，因爲他們不過是像個孩子、天真無知，且絲毫不具威脅性。我們仁慈地保持讓他們進入這個大家庭的可能性，像一位仁慈和藹的父親，而這也是爲了孩子自身的好處。在吳鳳這個單元中，少數民族的文化並無重要性；偉哉中華文化對所有的「我們」而言，已經是足夠了。我們是與四方夷狄之邦分判的準據，是偉大和意義的唯一標準，「我們最通俗普及的想法和作法不只是最好的，還絕對在道德上，比起其他民族，是最優越的」(Cartledge, 1993: 59)。在此情形之下，偉大的精神導師孔子堅持「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並視此必不可廢之「禮」象徵著高度文明及道德文化發展，此一明訓甚且在高級中學「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中成爲中華文化之理想自我典型。但是，原住民民族之獵取人頭作爲祭神之犧牲，則無論其在原住民族文化及社會脈絡下之潛在深層意義如何，均被視爲迷信、野蠻，需加革除掃蕩。而在革除掃蕩之後，異族即不復存在，一切均是我族。所以這種手法不同於古希臘人所用之 Us-Them，而是 Us-us，請注意，此處兩個 us 的不同，第二個 us 乃是小寫開頭：一個大的我族把一個小的異族變爲我族的一部分，不

但沒有對等相待，也沒有你我之別，然後一切差異均被解消了。各族皆同化至我族光輝偉大的文化之下，他們的主體性乃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應受教化以扭轉固有本質）。

## 參、歷史與幻構之區別

另一方面，吳鳳迷思具有社會心理上的集體的重要性，並持續地為政治利益服務。這個故事早自前殖民政府---日據時代---即不斷地被創造、再創造，並持續地為當前的政權所運用操弄，出現在教材中的時間已逾數十年。這樣長時間的「洗禮」早已使此一神話或迷思成為我們社會的「共同財產」(common property)。但是在歷史上是否為真、教育上是否可欲，似乎已經不重要了。在這一單元中，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人格高尚的吳鳳不但「漢人與鄒族的看法有極大的差異」，例如官鴻志(1987)訪問鄒族之結果，乃是吳鳳「盤剝榨取」，致使鄒族「殺以復仇」(官鴻志，1987:82)；而且「...經人類學與史學的研究，現以可確定其為經濟剝削之關係所造成的殺戮行為。」(王嵩山，1990：77)。另學者陳其南也在比較分析國小教科書中的吳鳳單元，和連橫臺灣通史之後，認為「假吳鳳不斷地被發揚光大，而掩蓋了真實的吳鳳」(陳其南，1986:118)。(無獨有偶地，美國家喻戶曉之偉大白人英雄 William Cody，或更著名的暱稱 "Buffalo Bill" Cody，事實上只是一位蒐購野牛皮、剝削印地安人，輸出推介印地安文物到東部大城給上流白人社會賞玩，進而致富、鬻官的一介商人，卻在好萊塢媒體的強力塑造下，親民愛民，甚獲印地安人的擁戴)。所以，在吳鳳的事例中，歷史的真象如何，至今仍撲朔難辨。但在全民都要受教的小學教科書中，被當成「歷史事實」來教，這對民族群體的歷史記憶留下誤解，對原住民產生偏見進而造成傷害；由教育的規準來看，實在是既不合認知性，亦不合價值性。

因此，這個單元混合誇大了的「事實」於主觀的、自我建構的「幻構」(fiction)之中，這是漢民族自我意象之歷史聖化與重建。對於這個現象，Cartledge在探討歷史上希臘人如何將所有好的特質均歸為希臘人，而所有不好的特質均歸為異族蠻人，進而在文化及心理上區分我族和他族時，論道：「要在歷史與幻構 (fiction) 之間畫出一條明確的疆界，乃是不可能亦是不可欲的」(Cartledge, 1993:36)。而且，「只要其能提供集體性的意義 (collective

significance)或是社會利益，幾乎任何人或事均可被迷思化」。Cartledge 甚且進一步以為：「迷思，將當前的錨，拋於過去之中」；故「毋論是人或神，有的因其所代表的事物，有的因其題材，均能在迷思中為無數的其他意義所掩覆，因此而常具許多弔詭的義涵」(Cartledge, 1993:20)。迷思的操弄，端視擁有權力之人的需要；對他們而言，歷史與幻構不再有區別，也不需有區別。但是，本研究以為，如果一個文化心靈長此以往地以這種混合歷史與幻構的迷思作為教育素材之時，勢必導致整個群體缺乏文化自省的能力。畢竟久而久之，自省的缺乏會使美好的文化理想，總有淪為虛妄假象的一天。

## 肆、幻象與虛妄假象

究竟美好的文化理想，和虛妄假象之間，有何差異？他們會分別導致何種結果、扮演何種功能？兩者間的關係又如何？學者J. Glass (1995)曾藉由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派觀點，深入地探討幻象 (illusion) (註3)和虛妄假象 (delusion) (註4)之間的區別，頗值得我們一探究竟。首先來看看虛妄假象。佛洛伊德認為虛妄假象代表的是一組令人驚駭的封閉信念系統，它在邏輯上自圓其說，而卻可能與事實恰為相反；不但對個人自我是危險的，令人由能調節管制原始衝動、以維持人格結構之平衡和諧的自我(ego)退化(註5)到最原始、最接近獸性本能、不受外在社會規範約束、要求立即滿足的自我(id)；也同時威脅社會穩定和政治組織，因為它常潛藏在具有政治動機的意識型態中，封閉了詮釋的可能，而且導致社會的退化(Glass, 1995:10-11,14)。

虛妄假象表現在政治生活上，正如同個人一般，群體會發現自身深為意識型態、戰爭、不願容忍、狂熱盲信，或意欲致人於死的盛怒等扭曲的狀況所淹沒。這意謂虛妄假象有重新塑造一個文化之意識、歷史與價值，或國家結構的能力：偏執狂(paranoia)可能制度化為公共政策，領導者只要求速效，民衆只渴望全有或全無的問題解決方式。這種退化使得大家更不耐煩於妥協和包容，愈為依賴暴力、各方勢力赤裸裸的角逐，和嚴刑峻法。這種退化導致社會共識受到威脅，公民的聯結(bonds of civilization)式微，理性回應攻擊與破壞的能力消失(ibid.:14-15)。虛妄假象在政治上的另一表現特徵乃是「瘋狂」，表現在集體地要求戰爭、復仇、反擊；表現在憎惡某特定政治、社會或種族群體；表現在持續其無限制的毀壞；表現在消除異見與強加恫嚇上

(ibid.:18)。

虛妄假象表現在文化退化時，正如同個人之精神的病態崩潰一般：人己之間的分際界域消失，巨量的憤怒釋放出來，並出現以暴力和殲滅他人的衝突解決方式。群體希望致人於死，而不希望與之協商；差異被視為是一種威脅。文化的退化帶來失序混亂：毀滅與暴力、宰制與虐待、意識形態的宣示等亂象，愈來愈具吸引力 (ibid.:24)。種族主義者宣稱某群體之絕對有資格占有某特定的領土，在呈現這些排外的、瘋狂的意識型態之論證，以殲滅特定的替罪羔羊時，自制、接納、寬容等價值變得何其薄弱，維護「差異」的能力幾乎消失 (ibid.:24)。虛妄假象，常連同專制主義者的狂暴幻想與脫韁憎惡一起出現，在歷史上常表現為排猶思想 (anti-Semitism)、帶有種族思想的民族主義，以及刺激整個文化與人民競相成為殲滅異族的工具 (ibid.:25)。在 Glass (1995) 的研究中，多次探討納粹德國之施於猶太人的暴行，以說明這種文化退化上所表現的虛妄假象，會引發人類歷史上多麼大的災難與傷痕 (ibid.:19,120-21,129-30,170)。

至於幻象，在心理分析學派的觀點中雖稱為錯覺，謂其並不真實，但仍視之為正常的心理現象 (請參考註三)。雖然病態的幻象或錯覺 (例如耽溺於自戀)，會阻礙個人對外在實存的投入 (Glass, 1995:184)，學者 D. Winnicott，則對其積極功能有頗多論述。Glass (1995) 說，依 Winnicott 之見，一個人在發展自我的同時，幻象也是必要的，幻象-----例如人與人間共享的一組假設或信念-----使個人意識到客觀的社會實存或他人的存在，從而與他人建立關係，產生連結。這是因為當人與人之間共享一組假設或信念時，能保護個人自我免於退化到虛妄假象或是心理錯亂的自我封閉狀態 (Glass, 1995:174)。這種具共享特質的幻象能允許個人實踐權力時不致無限延伸其誇大的自戀欲，而能以互惠的精神，增進個人與他人對「差異」的尊重。也因此，這樣的幻象能激發個人產生平等互惠的責任與義務感 (ibid.:176)。例如，在一社會中，人民信仰著民主、權利、正義與自由等價值，並願共同行動以追求這些價值，即使有時這種信仰在嚴酷的政權下似乎只是一種錯覺，這些幻象-----而非虛妄假象-----仍然是真實的，而且就在「那兒」，因為他們所訴說的是人的生活、共享的權力，及其允諾 (ibid.:176-77)。由此觀之，幻象乃是一種介於自我虛妄的幻想 (delusional phantasms)，與外在實存結構的共識之間的一種緩衝機制 (ibid.:183)。

我們不妨借用以上 Glass 的概念，分別檢驗傳統漢民族思想中所提供的幻象，以及吳鳳這個融合歷史與幻構的迷思所服務的虛妄假象 (delusion)。首



先，透過學校化和制度性的建構，中華傳統思想中的道統所提供的文化意象---幻象 (illusion)---乃是我們是仁義的、慈愛的，在道德及文明上高度發展的。理想中，此一幻象確能鼓勵現代社會中「政治上潛在的民主性」，因為它是那麼光明美好，提供一組能共享的信念，使中華文化具有不斷前進的動力。但是如果我們誤認為它所提供的自我圖象能反映真實而完整的自我，而疏於自我檢視深藏於我們文化中黑暗醜陋那一面的能力，由此將導致原先美好的幻象，封閉了詮釋的空間，使理想的自我型變得具有自戀的傾向，封閉的結果使其後撤為虛妄的假象。我們沒辦法面對，只有拒絕或逃避內心裡陰暗幽微、無意識的「另一面」之誘惑試探。有時，大災難會在突然之間爆發，而這乃是對抗內心中「另一面」所意涵的虛妄假象之誘惑，抗拒失敗的結果。二十世紀中葉由納粹德國所施於猶太人之令人髮指的暴行，如前所述，在Glass及多位學者的研究中，已被視為群體精神病徵的典型事例。而回顧中華民族的文化心靈，本研究初步以為；中國大陸在六〇年代至七〇年代所瘋狂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和九〇年代全球矚目、匪夷所思的天安門事件，其中種種的荒謬悖理、殘酷錯亂、停止對話、尋找替罪羔羊，都未嘗不是一種民族心靈深處之長期潛在的陰暗、無意識、黑暗醜惡的一面之突然爆發，這是虛妄假象的勝利，文化理想或是幻象的淪落；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或整個中華民族心靈上苦澀的一頁。

問題的徵結在於我們必須對潛藏在所建構的理想自我典型中所可能產生的陷阱，有所警覺。依據Glass的想法，理想的自我型(ego ideal)乃是內在的心靈之呈顯，它導向自我成長和解體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一個健康的理想自我型提供美好的文化理想，或是幻象---鼓勵互惠，互相對待，分享，合作，衝突解決，和忍讓。當它是病態時，對自我的影響則是否認共識的實存，後撤為虛妄的假象，並將其所投射的假象視為真理---也就是精神病(Glass, 1995:134)。在此同時，「當一群體的行動是透過理想自我型的自戀欲的驅使時，當看起來他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一組自我增強的封閉系統內的信念時，此群體即具有變為精神錯亂的潛在可能」(Glass, 1995:196)。在此情況下，病態的精神錯亂確實變為「具有魅力、拉扯力；它醜惡的本質自身即具無限的吸引力，因為它訴諸於自我心靈結構中，個人和整個文化花費了好長的時間和努力，去偽裝、投射和躲藏的事物。這種莫名的吸引力或許能解釋為何許多藝術家及作家發現自身深被人性及人際關係中殘酷、悖理荒謬、但卻如夢似幻般的面向所吸引。畢竟，精神錯亂乃是真正的我之另一面、大部分未受探索的那一面。這種情形不只是在個人的自我，文化及政治生活也都是會出現的」(Glass, 1995:172)。

從這個角度言，吳鳳迷思所服務的乃是虛妄的假象，並在教育機制中飾以「歷史知識」的面具。這確可說是一種「偽裝、投射和躲藏」。我們設定另一人作為代罪羔羊，並投射我們自我中的另一面於它的身上。我們「將自身的處境置於人性位置中無盡的矛盾處」，並且「毫無尊重與他人的分際、界域與差異的意願」(Glass, 1995:194)，雖然在吳鳳的迷思中，我們並不想承認這一點。在此一迷思中和我們有異的他人---原住民---並無值得尊敬處，而且最後在我們正義的感召之下心悅誠服地歸順於中華文化之下。從這個自我驗證、自圓其說的迷思中，我們似乎解除了我們內心無意識中黑暗、害怕的那異化的一面。這意味著，雖然理智上我們所建構的乃是最好最理想的自我---也就是前述的幻象，但在內心深處，我們仍然懼怕任何與我們有異的他人，無論這「他人」是在吾內或在吾外。所以，創造(或是捏造)一個迷思，倒不失為一個勸解自己「其實沒什麼能構成挑戰和威脅、或值得害怕」的好法子。正如同在吳鳳迷思的最後，原住民---那個「他人」---多麼深為我們偉大的文化所感動，他們於是心悅誠服地歸順，並成為我們之中的一部分。但是，這種潛藏於內心深處的懼怕真正隨著迷思中的羔羊而解除了嗎？或是我們仍「將自身的處境，置於人性位置中無盡的矛盾處」而仍不自知？

## 伍、內心的陌生客(the strangeness inside us)

吳鳳迷思對社會所造成的另一影響乃是教育上之不可欲的結果。對大多數年輕一代而言，他們多由類此的虛妄假象中習得偏見和無知，對他人的文化不欣賞、不尊重；對自己的文化缺少自省。因此，對漢民族而言，要自我正視的是，「他人並不是邪惡的，邪惡的乃是我們自身：怪誕詭異、外來不相關的(foreignness)，乃存在於我們之內。我們是自己的外來者(foreigner)，我們是自我分裂的。更由於這種分裂，個人和民族都經常犯下罪行」(Glass, 1995:205)。更嚴重的是，「如果我們即是外來者，那麼去毀滅或是傷害他人乃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因為並不是那代罪羔羊喚起潛藏之暴力，而是我自己害怕無能面對，或無法接受內在於我們自己的陌生客(strangeness)之誘惑」(Glass, 1995:206)。因此，重要的是一文化如何正視自我心靈的每一部分，找出那個外來者、陌生客，學習和他相處。這正如Glass所說，「自我經常由許多相當醜陋的激情所組成，這乃是人性經驗中的自然現象且不必然是具毀滅

性的」(Glass, 1995:21)。這對於提醒我們不要重蹈覆轍乃是非常珍貴的。

對原住民年輕一代而言，則自我異化於整個社會、自身社群，甚至自我心靈之外的現象相當普遍。他們找不到理想的認同對象，以聯結有意義的他人和自我。依據Benjamin的看法，這形成一種負面肯認。在負面的肯認循環(negative cycle of recognition)中，「銷毀外來的他人會使一個人感覺孤單，臣服於他人會使一個人感到調和」(Benjamin, 1988:28)。負面肯認之結果也可同時變為向內或者是向外的攻擊性。對許多國家的少數民族成員而言，我們幾乎可以說，這種負面肯認的情形經常發生。少數民族群體多面臨語言文化一天一天的流失，多數青年無法說自己的母語，對自己的文化亦無認識。更難堪的是，導致原住民污名化的自我意象。(同樣地，在許許多多的西部電影中，白人牛仔和印地安人互相爭鬥，而不知怎地最後總是英勇有智慧的牛仔贏得勝利。影響所及，連印地安孩童都盼望長大之後最大的夢想就是當一位牛仔。他們疏離於自身的語言文化，稍後在他們的生命中，亦在主流社會中成爲邊緣人。)

雖然他們看起來靜默、順從，這種靜默順從卻導致他們抵拒自我，「……這變成是一種自我宰制的方式，混淆自我意識的吶喊於不能置爲標的、無法攻擊的對「威權」的敵意於一體」(Benjamin, 1988:5)。許許多多原住民青年令人嘆息的社會心理情狀，皆可說來自於這種自我抵拒，自我異化，和自我宰制。或許這正是付出的代價最小，最不冒險的存在方式。在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對威權的討論之經典作品"The Grand Inquisitor"中，曾有一大哉問，和出人意表的回答。「爲何愛的自由行動(free act of love)會被轉化爲降服屈從般的行徑呢(a practice of submission)」? The inquisitor 的回答乃是：「人們並不真的想要自由與真理，這兩者只會引發剝奪和受苦。人們真的想要的只有奇蹟、神話和權威。……順服所伴隨的痛苦，比起自由所引發的痛苦，要來得受人們的喜愛」(Benjamin, 1988:5)。這樣的觀點能否解釋大多數台灣安靜沉默的原住民的內心深處，仍未可知，然有待進一步的探究。但無可否認的，在靜默順從的背後，確有不爲人知的辛酸和無知。即使吳鳳單元取消了，對羔羊們所造成的結果---讓他們成爲社會的陌生客，更成爲自己的陌生客---何時才得以解消？

## 陸、結語：相互肯認之重要性

如果本文試圖揭露潛藏在思想與心靈底處的關鍵部分---即無意識的,陰暗糾結的一面---那麼,下一個具關鍵性、應加探討的要素是什麼呢?如果要使理想自我型導向健康的發展,而非解體或心理變態,又要作些什麼呢?本研究以為,除了 Benjamin 所述的「自我的確立」(self-assertion)之外,「呈顯自我與他人乃是有區別,但相互關聯的存有」的相互肯認(mutual recognition)之概念頗值得參考(Benjamin, 1988:20)。Benjamin 引述 Winnicott 的話認為,一個人覺得有真實感(feeling authentic)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乃是認知到外在實在並不只是自我之主觀投射而已,還包括與他人心靈接觸之經驗(Benjamin, 1988:37)。我們必須體察到自我所相遇的另一他人,也是一個「自我」,也是有自己權力的另一主體。此一概念假定,我們能夠而且必須認可其他主體乃是與我不同,但又相似的個體;他是一位能分享相同心智經驗的一個他人,這是一個主體與另一主體的相遇(Benjamin, 1988: 20)。

所以,無論對個人或社會群體之發展,其課題不只在於我們如何從看起來似真的一整體(the seemingly ostensible oneness)之中分化出來,達成自我之確立,更在於我們如何適當地聯結及肯認他人。於是,當我們肯認到他人時,健康的理想自我型由之而生。這種肯認行動之歷程「由一主體流動到另一主體,從自我流動到他人,再流動回來」(Benjamin, 1988:36)。這乃是一動態的歷程,因為「建立起我自己,意謂著贏得了他人的肯認。贏得他人的肯認繼之反過來意謂,我終於承認他人之存有乃自為其存有,而非只是為了我」(Benjamin, 1988:36)。而且我們必須經常體會到:「另一他人作為一主體,乃是外在於我們控制的,但是我們需要他」(Benjamin, 1988: 220)。所以贏得他人肯認和擁有自我確立乃是兩種同時發生的需求。吳鳳單元已經從教科書中取消逾十年了。但我們仍必需持續地時時檢視我們民族自我心靈的每一層面。否則, Cavafy 在其著作「等待野蠻人」之中的疑惑不免也會持續地成為我們的疑惑,進而讓我們陷入另一陷阱:「現在不再有那些野蠻人了,那麼,我們又會變為什麼呢?---那些野蠻人總曾是個解決問題的法子呀!」(Cartledge, 1993:36)。

## 附 註

- 註 1：吳鳳神話之內容主要在說明漢人老通事吳鳳如何捨生取義地教化山地同胞戒除獵人頭祭獻之殘忍風俗。此神話在日據時代即已出現，國民政府遷台後五十一年版社會科第一冊第一次出現「吳鳳」，至七十六年在社會群體的抗爭及所引發的社會緊張之下，教育部決定刪除。
- 註 2：Recognition 此譯肯認，意謂彼此認可，及進一步肯定這種認可之義。
- 註 3：illusion 一詞在心理分析學派中較常見的翻譯是「錯覺」，意指「錯誤的或扭曲事實的知覺經驗，亦即所得知覺經驗與知覺對象特徵不一致的現象。錯覺並非心理失常，錯覺是正常現象。」（見張春興，張氏心理學辭典:319）。在本研究中，則由於是相對於虛妄假象（delusion）而言，且所引用文獻多持正向觀點，肯定 illusion 在個人或群體之心理歷程中所扮演的積極功能，為彰顯這種功能，譯為「幻象」。
- 註 4：delusion 一詞常譯為「妄想」，指「個體經常持有的某些既無事實根據，又極不合理的觀念。間或的妄想，人皆有之，但如經常妄想，則將成為精神疾病的徵狀。按精神醫學，妄想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徵狀之一。」（同見張氏心理學辭典:182）。本文譯為「虛妄假象」，以相對於「美好幻象」。
- 註 5：退化（regression），此詞出處亦源於心理分析學派，為防衛方式之一，「指個人遭遇挫折時，以較幼稚的行為應付現實困境，藉以惹人注意或博人同情以減低自己的焦慮。」（同見張氏心理學辭典:550）。民主社會中群體的退化一如個人之由自我（ego）退化到本我（id），會由次級歷程的心智運作如妥協、包容等民主價值，退化到初級歷程的不願包容、盲目的愛國主義、種族主義，及以暴政壓制人民，見（Glass，1995:15）。

## 參考文獻

- 王嵩山（1990），*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臺北：稻鄉出版社。
- 官鴻志（1987），一座神象的崩解---民衆的吳鳳論，*人間*，22期，62-83。
- 陳其南（1986），*文化結構與神話---文化的軌跡〈上〉*。台北：允晨文化。
-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東華書局。

主題文章

黃春木 (1995)，近代以來中國國民教育之發展 (1904-1940)----國家認同的建構，臺灣師大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Benjamin, J. (1988 ). *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Cartledge, P. (1993).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lass, J. (1995). *Psychosis and Power: Threats to Democracy in the Self and the Grou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本文作者現任台北市立內湖高中教師，臺灣師大教育碩士，主修多元文化教育

## The Other Side within U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Wu-Feng Myth

*Liou, Wei-Chih*

The Wu-Feng Myth, which was created and manipulated by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adopted in the textbooks for primary schools for decades, has been deleted from textbooks since 1987 after causing social tension among ethnic groups. But the negative images to the Aborigines still prevail through out the whole society.

In this myth, the mainstream Han Chinese Wu-Feng was depicted as being so self-less that he even sacrificed himself to dissuade the barbarian Aborigines from the cruel head-hunting ritual. Finally, the Aborigines were so moved by his great behavior, they voluntarily submitted to the great Chinese culture. But actually, this myth is nothing but a mixture of exaggerated history and fiction, providing cultural delusion rather than illusion. The Aborigines were a scapegoat, which represents the dark and ugly side deep within the great Chinese culture. By deleting this ugly side which was projected to the Aborigines, Han people seem to avoid the need to scrutinize Chinese culture anymore. Han are contented with their great culture. Since this myth was delivered to young generations for decades, most Han people have lost the ability of cultural self-reflection. This would be a symbol of potential possibility of group psychosi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only if we scrutinize the dark side within us thoroughly, will we develop a healthier group ego ideal. The Wu-Feng Myth might be a very tiny mirror; however, if we recognize thi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istake, and then treasure this precious experience, our society will develop that healthier group ego ideal.

英文摘要

Keywords: Wu-Feng 、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 Us-Them 、 Psychosis and Power

---

*Teacher of Taipei Municipal Nei-hu Senior High School*